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少数的法则

[美] 路易莎 著

校 真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少数的法则 / (美) 路易莎著 ; 校真译 .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9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ISBN 978-7-81126-146-2

I. 少… II. ①路…②校… III. 苗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K89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542 号

少数的法则

[美] 路易莎 著

校 真 译

张 辉 译校

策 划: 张三白

责任编辑: 立 道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聚阳文通书局

设计制作:  贵阳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146-2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瓊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

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 60 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08 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其主题是苗学。因为苗族是贵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苗学的不同阶段最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苗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苗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而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千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那所著的《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

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白。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付出

的艰苦努力——他从 1968 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 21 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 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 10 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 1936 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

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年代至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至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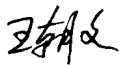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并请与本社联系。

出版者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 世纪 80 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 600 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按：路易莎是中国对外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对苗族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本书是她苗学研究的代表作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现代西方学者对苗学研究的视角和观点。

序言并致谢

本书是关于“民族（Minzu）”的，“民族（Minzu）”是中文对 ethnic groups（民族的群体）的说法。同时，这本书也是关于现代性的，关于民族和现代性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化政策的呈现。我之所以写作本书是由于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的设立源于几种原因。首先，源于我在美国结识的一批在老挝称作 Hmeng（Hmong）的苗族。我最初认识他们是在 1979 年，那时我在罗德岛州的州府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读大学。在那里，我对 Hmong 人的情况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教 Hmong 人妇女英语，曾与他们合作经营一个手工艺品的作坊，用影片记录他们移民到美国的历程。然而，Hmong 人的情况不只限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过去，还会延伸到未来，这促使我去了解他们移民的困窘背后的情况。Hmong 族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遗失”——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故乡，以及他们古老的文化。与失去亲人和远离故乡不同，这些人并未把自己的文化遗失归结到美国参予的越南战争上——尽管美国曾经雇用老挝的 Hmong 人参加秘密的游击队。正是这点使得他们在美国撤退后沦为政治难民。Hmong 族的文化遗失比那更早，要早几百年，那时，Hmong 人们从中国南下。在美籍 Hmong 族人的记忆中，他们的祖辈在逃亡时身边都几乎空无一物，唯一保留着的，只是他们的文化碎片。正是由于深信这一点，所以在美国的 Hmong 族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我们的民族，你应当去我们的祖国——中国。”

1982 年我大学毕业时，获得一笔研究美国 Hmong 人先人根源的学术基金。我的计划是去寻访那些在法国的 Hmong 人社区、泰国难民营、泰国乡村以及中国的苗族地区。我希望能发现 Hmong 人让我确信的、的确存在着的他们的底层文化，正是这种底层文化使分散在各地的 Hmong 人联系起来。我在法国和泰国的 Hmong 人社区呆了四个月，学

习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风俗，在分散于各地的 Hmong 人看来，这种风俗正处于消失的边缘。1982 年春天，我到了北京，兴奋地认为我最终会找到 Hmong 族的根。我是第一个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被批准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做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我已经学会了很多“Hmong 语”，并携带着有关他们的幻灯片和手写文稿。我用“苗族”这个词来指称 Hmong 族在中国的正式名称，我希望在那里能发现完整的 Hmong 族遗产。

到达北京后几天，中央民族学院的外事办安排我和一些苗族人在校园里首次会面。当他们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的服装与我在东南亚所熟悉的 Hmong 族的大相径庭，而当我用 Hmong 语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却没有反应。他们向我打招呼的语言，我竟然一句都听不懂。汉语翻译帮助我吃力地列举他们的文化特征，结果我发现几乎找不到融会点，我愈发感到困惑，而且我自己的“研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这些人真的是 Hmong 族吗？如果是，为什么他们的文化跟在中国以外的 Hmong 人的文化看上去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们又作为“苗族”代表的身份出现呢？据我理解，中国的苗族就相当于 Hmong 族，但是假若居住海外的 Hmong 人将“苗”理解为有贬义的名字，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又一直保留这个称呼呢？

1982 年，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来为这些问题找答案。那时的苗族聚居区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所以我只能在北京、四川、云南以及湖北的民族学院作研究（贵州省当时是完全封闭的）。我当时猜测，尽管苗族与 Hmong 不属于同一范畴，但苗族仍然是特定意义上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但却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民族。苗族之作为一个民族建立起来，是依据他们的历史和语言划分确定的结果，他们当时也接受了这样的划分。由于毛泽东时代和他以后的时代的历史背景，由于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市场化的影响，苗族人的特点，它与我在美国的 Hmong 人朋友以及我当初想象的“特点”毫不相干。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性消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了，也不意味着在中国内部的苗族所特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就不代表苗族文化的身份。出于我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性质，我希望了解政治如何促成了不同的但却稳定的社会类型。

我曾分别于 1985 年、1986 年、1988 年和 1993 年先后四次去中国。所到之地有贵州、云南、湖南三省，去过分属不同苗族支系的村寨大约 30 个。这项研究总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有一年时间，我在贵州省黔东南山区一个叫做“西江”的苗族村落作实地考察，也有大量时间在北京、贵阳这样的中心城市度过。苗语随地区不同而迥异，许多地区间的苗语是彼此不通的。所以，除了在西江我掌握了当地的一些苗语，把它和我日渐增长的汉语结合起来，在其他地方，我主要依赖汉语（普通话和中国西南方言）作为实地考察时所使用的语言。我碰到的大部分苗族人都会说汉语，如果他们不说汉语，我就得找当地的苗汉翻译了。我很少讲英语，只是 1982 年算是例外，因为当时我几乎还不会讲汉语。本书中出现的汉语音译，采用的是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除非特别说明，所有中文名的英译皆由我自己完成。有的情况下，本书中的人名作了改动，除了那些愿意我写下真名的人。

中国境外那些认为自己是 Hmong 族的，坚持“Hmong”是他们唯一的族称。实际上，在西方甚至东南亚，人们不用“苗族（Miao）”及类似的如“Meo”这样的称呼。我所认识的中国境外的大多数 Hmong 人希望，他们在中国的同胞也采用 Hmong 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然而我所认识的中国国内自称为“Miao（苗）”的人们，却并没有这样的愿望。同样，大多数自认为苗族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也不称自己为“Hmong”。实际上他们采用了许多相关的民族名称，Hmong 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将详细讨论。中国社会背景下的民族名称具有政治色彩，这和西方是不同的。另外，自从我 1982 年去中国旅行以来，许多美国的 Hmong 人精英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并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到中国旅行。据他们说，生活在东南亚的毗邻中国边境的这些人也对“苗”的称呼有疑问。考虑到尊重他们的意思，我以 Hmong 而不用“苗”称呼居住在中国境外的该族人；而中国境内的该族人已经接受了别人称他们为“苗”，我就随他们的习惯仍旧称他们为苗族。此是不得已的折中办法，并不意味着我摒弃了那些美籍 Hmong 人的观点和立场。在我看来，民族的不同称呼，是政治历史沿革的结果。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将成为本书的主体内容。

我诚挚地感谢中国的苗族和中国境外的 Hmong 族，他们在生活上

帮助我，并让我和他们共同分享他们的知识。从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Central Valley），从寒冷的明尼苏达到闷热的泰国难民营，从北京的院校到黔东南的山区，他们给我提供住处，让我有家的感觉，他们给我敬酒以表欢迎，用苗语方言给我起名字（用 Hmu 语叫我 Ad Nax，Hmong 语叫我 Maiv Liag），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我他们关心的一切和他们奋斗的经历。我特别感谢我在中国遇见的老师和活动的主办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给了我机会，使我的研究有了可能。他们是：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宋蜀华、安毅夫、已故的张正东、李廷贵以及杨仁敬。还有许多人以别的方式帮助过我，他们是：Hong Fang、Yang Tongying、Li Jun、Li Hui、Li Chao、和特别值得一提的 Wurlig Bao，此外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还有：（按字母顺序）阿桑、曹翠云、陈启光、冯先毅、郭静、纪玲、贾国华、金鸥、蓝珂、李宾泽、李锦屏、李仁珊、龙建刚、罗秀英、马树兰、潘新熊、王秀英、杨兵、杨歌、杨启明、张晓、周梁，以及无法在此全部列出的更多的人。在法国以及后来在美国，有杨道和别的美国 Hmong 族人，以及 Kaying Yang，Yuepheng Xiong 和 Tzerxa Cherta Lee，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和支持。其实很多时候，我应感谢的不仅是某些人，而是更大范围的所有人，我也感谢上面列出的这些给我帮助的家庭，他们接纳我住在他们家里，负责我的生活。感谢我第二故乡的西江人，他们使西江成为我在中国期间住过的最好的地方，我在艰难的田野考察工作中精力充沛应当归功于他们。以上的个人或机构可能并不完全同意本书中提出的论点，但他们给予的多样帮助使我的项目如期完成。

我还要感谢 1982 年到 1993 年间资助过我研究的组织。1982 年的项目得到布朗大学 S.T. 阿诺尔德（华森）的研究基金（Samuel T. Arnold（Watson）Fellowship）；1985 年和 1986 年的短期旅行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资助，它们来自该校的人类学系洛维基金会（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owie Fund）、东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和人文研究所（Humanities Institute）；我在 1988 年的实地考察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富布赖特·海斯博士论文海外研究项目（the Fulbright-Hays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search Abroad

Program) 的资助。我的论文写作得到国际兰馨创立者地区基金会 (Sorooptimist International Founder Region Fellowship) 以及 Phi Beta Kappa 协会奖学金的部分资助; 罗格斯大学研究委员会 (Rutgers University Research Council) 资助我 1993 年的实地考察。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的许多单位和个人, 他们敞开大门接纳了我, 免掉我一些费用并使我得以减少生活费用的支出, 他们的慷慨也是我难以用感谢来回报的。

本书从构思、执笔到修改完善, 我都得到了他人的学术帮助。这些帮助来自伯克利分校指导我哲学博士论文的老师, 以及罗格斯 (Rutgers) 大学的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学生: 论文委员会主席 Aihwa Ong 给我的论文作出中肯的指导, 鞭策并促进了我的学术实践, 她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至今仍然是对我的鼓励; 杰克·波特 (Jack Potter) 对中国人及对从事人类学的热情是我极好的榜样; 弗莱德 (Fred Wakeman) 广泛的兴趣、深刻的洞察力、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丰富的幽默感使本研究的内容更加充实, 也增加了我的研究热情; 伯克利人类学系指导过我的老师有杰瑞尔德·白雷曼 (Gerald Berreman), 史丹利·布兰德兹 (Stanley Brandes), 伊莉莎白·寇尔森 (Elizabeth Colson), 乔治·德弗斯 (George Devos), 阿兰·邓迪斯 (Alan Dundes) 和纳尔逊·格雷本 (Nelson Graburn); 还有来自伯克利分校以外的指导教师也给我许多指教, 他们是: 安·安娜诺斯特 (Ann Anagnost), 泰尼·巴洛 (Tani Barlow), 盖尔·克里格曼 (Gail Kligman) 和布拉凯特·威廉姆斯 (Brackette Williams)。我还要提及我在初入人类学之门时曾给我建议和鼓励我的几位朋友和指导老师: 我的大学本科导师鲍伯·贾伊 (Bob Jay), 已故 W. 爱伯哈德 (Wolfram Eberhard), 已故 M. 弗里德 (Morton Fried), 安·沃特勒尔 (Ann Walternier), K. 赛义德 (Kamaruddin Said), 已故的 M. 沙罗延 (Mark Saroyan) 更要特别提及。

本书手稿的润色也得益于许多人的认真阅读。早期, 我论文写作组的成员珍妮·比尔 (Jenny Beer) 和玛希·达罗夫斯基 (Marcy Darnovsky) 耐心地给我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还有 V. 亚当斯 (Vincanne Adams), 苏珊·布朗尼尔 (Susan Brownell), E.R. 科伦 (Edgar Rivera Colon), M. 莫费特 (Michael Moffatt), E. 席恩 (Ed Schein), 罗格斯/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阅读小组成员于君方, Dorothy Ko, Sue Naquin, R. 洛

加斯基 (Ruth Rogaski) 和 B. 台塞尔 (Buzzy Teiser), 以及杜克大学出版社 (Duke University Press) 的两名匿名审稿人都仔细评阅了全部书稿。仔细阅读过本书手稿中的部分章节并作出评论的还有这些人: Lila Abu-Lughod, K. 巴拉德 (Karen Barad), Elaine Chang, N. 科尼叶兹 (Nina Cornyetz), D. 克提斯 (Debra Curtis), H. 达维森 (Harriet Davidson), E. 戴蒙德 (Elin Diamond), J. 法夸尔 (Judy Farquhar), L. 费尔兰德斯 (Leela Fernandes), J. 赫维亚 (Jim Hevia), L. 肯达尔 (Laurel Kendall), A. 吉普尼 (Andrew Kipnis), R. 李卿格 (Ralph Litzinger), M. 芒加纳罗 (Marc Manganaro), 欧挺木 (Tim Oakes), B. 罗宾斯 (Bruce Robbins), C. 萨尔兹曼 (Cynthia Saltzman), C. 苏扎 (Caridad Souza), T. 瑞登堡 (Ted Swedenburg), N. 塔普 (Nick Tapp) 和张旭东。罗格斯大学的当代文化分析评论中心和妇女问题研究所在我撰写论文关键的一年, 提供了资金帮助和学术参与; 我非常感谢中心和研究所的各位同仁对他们读过的章节提出了严谨准确的问题; 和我共同研究书稿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玛丽·默里尔 (Mary Murrell), 一位非常值得交流的人。当然, 最后成书还得由我自己独自负责。

本书编辑肯·维索克 (Ken Wissoker) 在我的作品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甚至在我尚未开始写以前, 他就笃信我一定能够写成, 在我写作过程的每一阶段他都耐心地给我提出种种具体建议, 更重要的是, 他在学术上广博的见解给我以至深至久的力量, 他给我的帮助无法衡量。杜克大学出版社的 K. 科特兰 (Katie Courtland), P. 莫里森 (Pam Morrison), B. 米兰东 (Bob Mirandon) 和别的出版社也给我以极有价值的支持。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的 Kaidi Zhan 和其他人在翻译上为我提供帮助, Nat Clyme 和我商讨并完成了插图, 罗格斯大学 (Rutgers) 地理系的 Mike Siegel 制作了地图, D. 斯皮诺拉 (Dolores Spinola) 在文录方面给我以多方支持, J. 维金斯 (John Wiggins) 为本书作了精细的索引。

当我因键盘紧张综合症无法继续写作时, 罗格斯健康中心的 K. 盖厄尼 (Kate Gaioni) 博士, J. 曼库索 (Joe Mancuso) 和 B. 戴维 (Bob Davis) 助我解除紧张, 以使论文写作能够继续下去, 尽管他们自己也许并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陈文锦 (Chen Wenjin), D. 马加诺夫 (Danielle Marganoff), M. 罗丝布莱特 (Margie Rothblatt) 和考尔 (Caur)